



摩尼教及其東漸

林悟殊著

摩尼教及其東漸

林 悟 殊 著

中 華 書 局

責任編輯：熊國禎

摩尼教及其東漸

林懷殊著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 10⁵/4 印張 · 32 插頁 · 245 千字

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1—3,200 冊

統一書號：2018·245 定價：3.20 元

ISBN 7—101—00160—2/B·35

前　　言

中古時代，波斯的摩尼教曾在中國廣為傳播，並產生了鉅大的影響，這已為本世紀來考古的發現及學者們的研究所證實了。以往我國對於該教教義的介紹，最為詳細的一篇是許地山先生於1928年發表的《摩尼之二宗三際論》；而對於該教入華傳播史的研究，奠基性的著作則要推陳垣先生1923年發表的《摩尼教入中國考》和1927年馮承鈞先生翻譯，沙畹、伯希和撰的《摩尼教流行中國考》。爾後我國學者有關摩尼教研究的文章，大多是對這三篇文章的發揮和補充。我對摩尼教及其東漸的探討，無非亦是繼承前輩學者的研究而已。假如本書各篇文章所提的一些看法，對於前輩學者的研究有所推進，對於傳統觀點有所更新的話，那首先是由於我是生活在八十年代，有條件可以吸收本世紀來中外學者辛勤研究的成果，從而能站在前輩學者的肩膀上攀登。

對摩尼教及其東漸這一課題的研究，是我在研究生學習階段時，在導師蔡鴻生先生的建議下開始進行的，整個研究過程一直得到他的具體指導。本書的每一篇文章，都凝聚着他的心血。在我的研究過程中，還得到領導、同志及親友們各方面的支持。更有幸的是，得到國內學界諸多師長、老前輩的關心、勉勵、幫助、指導，其中有我校的蔣相澤先生、胡守爲先生、姜伯勤先生等；還有廣東史學界老前輩朱杰勤教授、金應熙教授，北京大學的王永興教授、張廣達教授，西南師範學院的孫培良教授，杭州大學的胡玉堂教授、毛昭晰教授、王正平教授。此外，還得到中華書局、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幾位編輯同志的大力支持和諸多指導。

為了較為系統、深入地進行研究，在資料收集上我是不遺餘力的。在這個過程中，得到香港和國外諸學者的慷慨幫助。他們是英國倫敦大學專治波斯宗教的著名教授 Mary Boyce 女士、香港中文大學的譚汝謙教授、日本東京大學的田仲一成教授、西德波恩大學的 H.-J. Klimkeit 教授、西德慕尼黑大學的 Helwig Schmidt-Glintzer 教授。

還要特別提到的是國立澳洲大學的柳存仁教授惠賜教誨；英國沃里克大學專治摩尼教的 Samuel N.C. Lieu (劉南強) 教授，經常給我寄來西方資料，與我進行學術交流，使我得益匪淺。

謹以寸草之心，向我的導師、向幫助我的學界前輩、師長、同志、國內外的朋友們表示最真誠的謝意！

構成本書主體部分的十八篇論文，多已在刊物上獨立發表過（參見本書《附錄·摩尼教研研究文獻目錄》），但在收入本書時，為了使它們更有機地聯繫起來，作了不同程度的修改、刪節和補充。限於水平，其中錯謬之處，定然不少，懇望學界前輩和同仁不吝賜教。

本書附錄的三篇漢文摩尼教經釋文，係本人根據原件照片重新校正並參考國內外學者研究成果加以標點的。點校時雖力圖彌補、糾正以往校錄本的一些疏忽或錯誤，但不妥之處，恐仍在所難免。指教是祈。

至於本書所附文獻目錄，原想把本世紀來中外發表的有關摩尼教研的論著盡行收入，以便學者檢索。但限於條件和個人能力，難免掛一漏萬，尤其是近年國外發表的論著，更不易收全，有待日後進一步補充，以臻完善。

林　悟　殊

一九八五年六月一日於中山大學歷史系

目 錄

本世紀來摩尼教資料的新發現及其研究概況	(1)
摩尼的二宗三際論及其起源初探	(12)
早期摩尼教在中亞地區的成功傳播	(35)
摩尼教入華年代質疑	(46)
唐代摩尼教與中亞摩尼教團	(64)
《老子化胡經》與摩尼教	(76)
回鶻奉摩尼教的社會歷史根源	(87)
從考古發現看摩尼教在高昌回鶻的封建化	(100)
慕闍考	(111)
宋代明教與唐代摩尼教	(120)
喫菜事魔與摩尼教	(135)
宋元時代中國東南沿海的寺院式摩尼教	(145)
唐宋《三際經》質疑	(159)
敦煌本《摩尼光佛教法儀略》的產生	(168)
《摩尼光佛教法儀略》殘卷的綴合	(177)
《摩尼光佛教法儀略》的三聖同一論	(183)
《摩尼教殘經一》原名之我見	(191)
摩尼教《下部讚》漢譯年代之我見	(208)

附錄

《摩尼教殘經一》釋文	(217)
《摩尼光佛教法儀略》釋文	(230)
《下部讚》釋文	(234)
摩尼教研究文獻目錄	(266)
(一) 西文部分	(266)
(二) 俄文部分	(325)
(三) 日文部分	(327)
(四) 中文部分	(330)
圖版.....	(1)

一	《摩尼教殘經一》	(1)
二	《摩尼光佛教法儀略》	(19)
三	《下部讚》	(25)
四	高昌遺址全景	(46)
五	高昌遺址一角(a)	(46)
六	高昌遺址一角(b)	(47)
七	摩尼畫像(a)	(47)
八	摩尼畫像(b)	(48)
九	書寫僧	(48)
十	懺悔圖	(49)
十一	女選民	(49)
十二	庇麻節	(50)
十三	三幹樹	(50)
十四	摩尼教的供養人	(51)
十五	旗幡殘片(a)	(51)
十六	旗幡殘片(b)	(52)
十七	絲畫上的選民	(52)
十八	女神和女選民	(53)
十九	樂師	(53)
二十	男選民	(54)
二十一	回鶻可汗入教	(54)
二十二	旗子與護神	(55)
二十三	繪有十字架的旗幡	(55)
二十四	裝飾葉	(56)
二十五	末日審判	(56)
二十六	《科隆摩尼古卷》(a)	(57)

-
- 二十七 《科隆摩尼古卷》(b)(57)
 - 二十八 粟特文抄本(58)
 - 二十九 《沙卜拉干》(a)(59)
 - 三十 《沙卜拉干》(b)(59)
 - 三十一 草菴(60)
 - 三十二 摩尼光佛雕像(60)

本世紀來摩尼教資料的 新發現及其研究概況

摩尼教是公元三世紀中葉波斯人摩尼 Mani(216—277_?)所創立的一個宗教。在現代世界中，它已沒有甚麼信徒了。但是，在古代中世紀的一千餘年中，摩尼教卻曾流行於伊朗、敘利亞、埃及、巴勒斯坦、北非、歐洲、小亞細亞、中亞細亞，還有中國內地的廣闊地區。可以說，從大西洋的西岸，直到中國的東南沿海，都曾不同程度地成為摩尼教徒的活動舞臺。摩尼教的經典曾由古敘利亞文先後譯成拉丁文、希臘文、科普特文、亞美尼亞文、中古波斯文、帕提亞文、突厥文、粟特文、漢文、大夏文、回鶻文、阿拉伯文等十餘種文字。摩尼教是古代歷史中的一個世界性宗教，在其所到之處都產生過鉅大的影響。蘇聯《簡明科學無神論辭典》“摩尼教”條下指出：“在歐洲被基督教會看作基督教異端的摩尼教，反映在保羅派、波高米爾派、純潔派和阿爾比派的思想體系中；在西亞，摩尼教對馬賚達克教（五至六世紀時由馬賚達克領導的人民運動，旨在反對貴族和高級僧侶）產生直接影響；在七至九世紀阿拉伯哈里發國家中，摩尼教是伊斯蘭教傳播的重要障礙。”^①而在中亞，它曾形成獨立教團，成為回鶻民族的國教；在唐代中國內地，它曾廣為傳播，並影響到唐以後的多次農民運動。

對於摩尼教的研究，在本世紀以前，主要是依靠間接資料，即依靠古代與摩尼教對立的一些基督教徒、伊斯蘭教徒的記載；^②而摩尼教本身，由於屢遭迫害，沒有留下甚麼經典和資料。因此，學

者們對於摩尼教的研究，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這種局限性直到本世紀初，纔終於被考古的大量新發現所打破。

摩尼教的新資料首先發現於我國的吐魯番。1902年，德國為英國在中國的考古發現所刺激，決定派遣柏林人種博物館的格倫威德爾 (A.Grunweldel) 教授及其助手民族學家胡瑟 (G. Huth) 到中國新疆考察。他們於是年8月11日離開柏林，從伊犁進入新疆，南下進抵吐魯番，在附近一帶開始一系列的發掘，得到了文卷手抄本和藝術寶物四十六大箱，於1903年7月回抵柏林。他們所運回的抄本，計有二十四種，分別用十七種不同的文字寫成，幾乎都是宗教內容。其中除了佛教、景教的經典外，還發現了人們期待已久的摩尼教經典抄本殘片。1904年2月21日，德國語言學家繆勒 (F.W.K. Müller) 發表關於這些摩尼教殘片的調查報告，^③宣告了摩尼教研究新紀元的開始。德國接着組織了第二次探察。這次探察由勒柯克 (A. von Le Coq) 教授及其助手巴圖斯 (T. Bartus) 負責，於1904年11月到達吐魯番附近的高昌，着手發掘石窟和寶塔。結果在一個摩尼教遺址上，發現了大量摩尼教文獻殘片和壁畫等；後來在柏孜克里克 (Bazaklik) 亦有所發現。爾後，勒柯克又和格倫威德爾會合，在吐魯番探察了幾年時間，直到1907年。他們得到大量的寶貴文物，其中摩尼教文獻殘片便有數千塊之多。據勒柯克分析，吐魯番原來所藏的摩尼教典籍應遠遠超過這個數字。他在報告中說，他來到高昌時，當地有個農民告訴他，五年前他在把一座廢廟夷為田地時，曾發現了成車手抄物，被他拋入河裏。從該農民所述的手抄本樣式看，勒柯克判定為摩尼教徒的手抄文書。勒柯克還報告他發現了一個地下摩尼教書庫，惜所藏的書籍都被泥水浸泡過，腐爛不堪，無從復原。可見吐魯番以前必定藏過汗牛充棟的摩尼教典籍。^④已找到的摩尼教文獻抄本主要用古突厥語

和三種著名的中古伊朗語，即中古波斯文、帕提亞文和粟特文寫成。有一塊小殘片是用大夏文寫成的，據說還有兩塊係用乙種吐火羅文書寫，但尚未發表。^⑤ 對於這些文獻所用語言的研究主要有：亨寧 (W.B. Henning) 的《吐魯番的中古波斯語動詞》，^⑥ 吉倫 (A.Ghilain) 的《帕提亞語試論》，^⑦ 格斯維徹 (I. Gershevitch) 的《摩尼教粟特文語法》；^⑧ 辭典類的著作主要有亨寧的《中古波斯語和帕提亞語詞目》，^⑨ 博伊斯 (M. Boyce) 的《摩尼教中古波斯文和帕提亞文詞目》等。^⑩ 摩尼教徒的手抄本不僅在其內容上與其他文獻不同，而且在使用的字體、用墨着色、圖解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色，因此學者們不難把它們和其他宗教文獻分開。德國所得到的數千塊摩尼教殘片，由於種種原因，至今尚未完全公諸於世；不過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柏林普魯士科學院已將大部份內容發表了。對於這些文獻的內容，各國學者已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最早發表調查報告的繆勒，爾後又繼續發表了一系列的研究著作。勒柯克亦發表了許多有關論文。此外，最早發表研究文章的還有俄國的謝勒曼 (C. Salemann)、拉德羅夫 (W. Rodloff)，接着有比利時的班格 (W. Bang)，美國的傑克遜 (A.V. W. Jackson)，日本的羽田亨，德國的謝德羅韋茨 (J. Scheftelowitz)、瓦爾茨米德 (E. Waldschmidt) 和楞茨 (W. Lentz) 等等。^⑪ 上面已提到的亨寧教授後來主持了這些文獻的發表工作，自己又對這些文獻作了大量的研究，著述甚多，1978 年出版了他的論文選凡兩卷。^⑫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研究工作受到了阻礙，柏林收藏的摩尼教文獻殘片被封裝轉移，到了五十年代纔重新啓封研究，幸好無甚損失。^⑬ 五十年代後，吐魯番摩尼教文獻研究的後起之秀，恐怕要數英國倫敦大學的瑪麗·博伊斯教授。她的《帕提亞文摩尼教讚美詩》一書，^⑭ 於 1954 年出版，書中對吐魯番發現的兩首最古老的帕提亞

文摩尼教讚美詩進行了整理和釋讀，卷首有長篇導言加以評述，卷末又附有詞彙表，為學界所稱道。博伊斯教授的另一重要著作是《摩尼教中古波斯文和帕提亞文讀物》。^⑯該書選輯了一批中古波斯文和帕提亞文的摩尼教殘片，加以詳盡的註釋，是研習吐魯番摩尼教文獻很好的參考書；^⑰作者在導言中，還結合書中所輯錄的文獻，對摩尼教的歷史、教義、經典、文字等作了簡明的介紹；上面已提到的《摩尼教中古波斯文和帕提亞文詞目》，正是作者為了幫助讀者研習這本書而編纂的。關於博伊斯教授這方面的研究工作，還應提及她所編纂的《德國收藏的吐魯番伊朗文摩尼教手抄文獻目錄》。^⑱該書使我們得以窺見德國吐魯番摩尼教文獻收藏的概況，於1960年出版。至於戰前德國所發表的吐魯番摩尼教文獻，則另被學者彼克（W. Peek）匯集編纂成冊，於1972年刊行。^⑲在吐魯番發現的摩尼教文獻中，有摩尼的重要著作《沙卜拉干》（Šābuhragān）的手抄殘片。據說，《沙卜拉干》是摩尼為了啓迪波斯王沙卜爾（Šābuhr）一世而用中古波斯語寫成的教義概要。其殘片戰前已有所整理發表，近年又被馬根基（D.N. MacKenzie）進一步整理、研究並釋讀成英語。^⑳在吐魯番發現的摩尼教文獻中，還有不少精美的插圖，被學者稱為工筆畫或細畫。這些細畫與在遺址上發現的壁畫表現出摩尼教特有的藝術風格，引起了學者們的極大興趣。對於這些藝術的研究，西德的克林凱特（Klimkeit）教授近年發表了多篇論文，如《三幹矮樹——摩尼教藝術和象徵手法的考察》、^㉑《摩尼教藝術中的印度教神》等，^㉒而其專著《摩尼教藝術和書法》則對這些藝術作了較全面的介紹。^㉓該書附有精製圖版幾十幅，惜乏彩色。

在吐魯番摩尼教文獻的發掘和研究上，我國學者亦有所建樹。黃文弼先生在他1954年出版的《吐魯番考古記》中，就刊出了他發

現的一篇回鶻文摩尼教文書的照片。1978年，耿世民教授將這篇文書釋讀發表，確認它係高昌地區回鶻官府頒發給摩尼教寺院的文件。我們認為，耿世民教授釋讀出來的內容，對於研究摩尼教寺院制度的發展變化，對於研究摩尼教本身的封建化是有重要參考價值的。英國摩尼教學者劉南強 (Samuel N.C.Lieu) 博士的《摩尼教寺院的戒律和制度》一文，^⑫ 主要依據的文獻之一便是耿教授釋讀的這篇文書。

本世紀初，差不多與吐魯番的大發現同時，在舉世聞名的我國敦煌地區的考古發掘中，亦找到了重要的摩尼教殘卷。其中之一是英國斯坦因 (Sir Aurel Stein) 在敦煌東南地區發現的《摩尼教懺悔文》。該殘卷係用古突厥文寫就，包括十五項具體懺悔的內容，全篇僅缺開頭部份，後來這部份亦被勒柯克在高昌的殘片中找到。該《懺悔文》是我們了解摩尼教徒宗教生活的一篇很重要的原始資料。早在1911年，勒柯克已對它作了一番校訂；其中的內容，許地山先生在他的《摩尼之二宗三際論》一文中有所詳細介紹。^⑬ 這篇文獻，蘇聯學者馬洛夫在他的《古代突厥文獻》一書中，認為是公元五世紀的作品，^⑭ 但有些學者則認為應晚於這個時候。1963年蘇聯出版的《突厥系研究》一書，發表了學者德米特里耶娃對該文獻的研究成果。^⑮ 德氏將分藏於倫敦、柏林和列寧格勒的懺悔文殘片加以完整聯串，並加註釋和俄譯。近年我國學者李經緯同志已在德氏足本的基礎上，將該文獻以漢語譯釋。^⑯ 對該文獻進行研究的一部最重要專著是丹麥學者阿斯姆森 (J.P. Asmussen) 的《摩尼教懺悔文研究》，^⑰ 書中對摩尼教徒的懺悔活動作了較為全面系統的考察，並與瑣羅亞斯德教、基督教信徒的懺悔儀式作了比較，頗得學界好評；書末還附有1904年至六十年代初西方和俄國發表的摩尼教研究論著目錄。

敦煌發現的摩尼教重要文獻更有從莫高窟石室藏書中檢出的三部漢文摩尼教殘卷。這些殘卷均被收入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五十四卷，分別名為《波斯教殘經》、《摩尼光佛教法儀略》、《摩尼教下部讚》。前兩部經典國內曾刊佈過，史學大師陳垣先生還曾加以校錄，惜仍有個別字差錯，斷句中亦有不妥之處；後一部經典則國內尚未刊佈過，而大正藏的著錄則差錯不少。是故，筆者特根據原件的照片，重加校錄，並參考國外學者的翻譯和研究，將這三部經典標點，作為本書的附錄重新刊出。關於這三部經典的研究概況，收入本書的《敦煌本〈摩尼光佛教法儀略〉的產生》、《〈摩尼光佛教法儀略〉殘卷的綴合》、《〈摩尼教殘經〉原名之我見》、《摩尼教〈下部讚〉原名之我見》等四篇文章已有專論，此不贅述。

我國摩尼教考古的重大發現，應特別提到福建泉州的摩尼教寺院遺址。早在本世紀二十年代，我國學者張星烺、陳萬里先生便已根據明代何喬遠《閩書》卷七《方域志》的記載，企圖找到這個遺址，未果。直到五十年代，經吳文良先生的考證，纔查實遺址之所在。^② 遺址位於泉州南門外四十華里的晉江縣羅山公社謝店大隊蘇內村（宋時為仁教里）的華表山麓，保存完好，當地人稱為草菴。該寺據說建於元代，清代重修過，解放後人民政府曾多次撥款重修，現為福建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草菴遺址保存有一座摩尼光佛的半立體浮雕像，並有一摩崖石刻，上刻“勸念清淨光明、大力智慧、無上至真、摩尼光佛”的字樣。^③ 草菴的摩崖石刻在“文革”期間曾遭毀壞。

本世紀來摩尼教新資料的發現，除了在我國境內的吐魯番、敦煌和泉州外，在埃及和北非一帶，亦有重大收穫。首先在本世紀初，學者們在北非阿爾及利亞的特貝薩（Tebessa）地方，發現了一篇用拉丁文寫的早期摩尼教經典，內容專論摩尼教團中選民（出

家僧侶)和聽者(一般信徒)的區別。研究這篇經典的主要著作有法國學者阿爾法里克 (P. Alfaric) 的《一篇摩尼教徒手稿——特貝薩資料》，1920 年發表於《歷史與宗教文獻評論》。^⑩三十年代初，又在埃及發現了科普特文的摩尼教典籍，計約有二千頁之多，內容包括了摩尼的書信、一部讚美詩、一部摩尼語錄——《克弗來亞》(Kephalaia)、摩尼著作的註解、摩尼教會早期歷史(從創教到公元三百年)、佈道書等。^⑪這些文獻，根據德國學者謝米德 (C. Schmidt)的研究，有許多是屬於摩尼在生時或其教團早期的作品。^⑫其相當一部份已經發表。^⑬但摩尼的書信和記載摩尼教會早期歷史的文獻，卻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毀於士兵手中。

摩尼教的文獻，本世紀七十年代又有了新的發現：在西德科隆大學蒐集的紙草文獻中，發現了一部袖珍的希臘語摩尼教抄本，每頁大小僅 4.5 釐米 × 3.5 釐米，寫字部份則為 3.5 釐米 × 2.5 釐米，平均有二十三行字，據說是目前世界已發現的一本最微型的書。原件據說是在埃及的一個墳墓裏發現的，為公元五世紀的作品。德國亨利茨 (A. Henrichs) 和科農 (L. Koenon) 的《希臘摩尼經》一文，對該抄本的樣式和內容有詳細的報道。^⑭全本 192 頁，其中 99 頁已用德文發表。^⑮主要內容在一些有關的英文著作中亦有介紹。^⑯從已發表的內容看，這部經典主要是論述摩尼的生平。現在不少學者認為，這部希臘文抄本便是上面提到的科普特文獻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毀壞的部份，即摩尼教早期教會史部份的希臘文譯本。

本世紀來，由於各國學者對摩尼教資料的不斷發掘、整理和研究，使人們對於摩尼教這個曾顯赫於古代中世紀歷史的世界性宗教的認識，越來越接近其本來的真實面目了。

① Краткий научно-атеист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М. 1964, стр. 336.

② 古代基督教徒反摩尼教的著作，根據作家的系統，可分為兩個方面：

(一)古代東方基督教徒的著作。古代敘利亞、美索不達米亞一帶的基督教徒，在人種、語言和生活習慣上與最早的摩尼教徒相同，因而對當地摩尼教徒的生活有較為深刻的了解。但是出於對異教的仇恨心理，在他們的著作中，對摩尼教難加攻擊，譽罵它為“居於黑暗的蛇”、“最危險的異端”等。在這些著作中，最早的一部要數公元四世紀前半葉阿弗拉底斯 (Aphratus) 的《佈道書》 (Homilies)，但學者們引用得更多的是埃弗來姆 (Ephraim Syrus) 的著作。埃弗來姆死於 373 年，距摩尼之死僅約一個世紀。他用的是古代敘利亞語，和摩尼絕大多數著作所使用的語言相同。英國學者米切爾 (C.W. Mitchell)、伯基特 (F.C. Burkitt) 和伯萬 (A. A. Bevan) 根據大英博物館六世紀的手抄本，已把埃弗來姆駁斥摩尼、瑪桑 (Marcion)、巴戴桑 (Bardaisan) 教派的著作譯成英語凡兩卷 (即 S. Ephraim's Prose Refutations of Mani, Marcion and Bardaisan, London, 1912—1921, repr. 1969)。另一位重要作家是巴爾庫尼 (Theodore bar-khoni)。他是七世紀初敘利亞瓦西特 (Wasit) 景教的主教。他用敘利亞語寫成的《斯可利亞》 (The Book of Scholia) 一書，直接引用摩尼原著。法國學者丘蒙 (F. Cumont) 在他的《摩尼教研究》第一卷中 (即 Recherches sur le Manichéisme, Vol. I, La cosmogonie manichéenne d'après Théodore Bar khoni, Brussels, 1908)，對於巴爾庫尼書中所述的摩尼創世說已詳加譯註。

(二)古代西方希臘和拉丁著作。這部份著作數量頗多，但因為摩尼教畢竟是東方宗教，被希臘文化、基督教文化所熏陶的古代西方人，對這個宗教的理解自然更多偏見。這方面的作家，首推“教會之父”聖·奧古斯丁 (St. Augusting, 354—430)。奧古斯丁在皈依基督教之前，從 373 年到 382 年間，乃為北非迦太基的一個摩尼教徒，因而熟知摩尼教的內情。他的《外道》 (Dehaere Sibus)、《反福斯特斯》 (Contra Faustum) 等幾部著作，被西方學者視為摩尼教研究的權威資料。但因為奧古斯丁和摩尼終究不是同時代人，他所跟從的摩尼教師——福斯特斯 (Faustus) 是否真正繼承摩尼衣鉢，有的學者對此尚表示懷疑。除了奧古斯丁的著作外，還有生活於四世紀初的赫格曼尼亞斯 (Hegemonius) 所寫的《阿基來行傳》 (Acta Alchelai)。該書敘述摩尼和美索不達米亞僧侶阿爾科勞斯 (Archelaus) 關於教義的論爭。死於 370 年的敘利亞保斯托拉 (Bostra) 僧侶狄托斯 (Titus) 寫了《破摩尼教論》一書；該書分四卷，現存有希臘文本和敘利亞文本。四、五世紀之交，羅馬帝國加沙 (Gaza) 的一個教會執事馬克 (Mark) 在其《加沙波菲勒傳記》 (Vita S. Porphyrii Gazensis) 一書中，亦記載了帝國境內摩尼教徒活動的一些細節，為研究者所重視。希臘僧侶神學家——塞佛留 (Severus, 約 465—538) 所留下的《佈道書》 (Homily) 亦保存不少摩尼教材料，上面提到的丘蒙的《摩尼教研究》一書的第二、三卷中便引證了其中的許多記述。此外，尚有埃比芬尼亞 (Epifanio)、里科普里斯的亞歷山大 (Alexander of Lycopolis)、辛波里西亞斯 (Simplicius) 等幾位作家的著作，都對摩尼教有所記載；這些著作亦已翻譯成現代西方語言。